

WENTIANXIANG
SHI YANJIU

文天祥诗研究

刘华民 著

巴蜀書社

文天祥诗研究

刘华民 著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李卫红

封面设计:钱伟明

文天祥诗研究

刘华民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总编室电话(028)6656816

发行科电话(028)6662019

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8.5

字数 200 千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80659 - 019 - 6/I·8

定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吴企明

文天祥是南宋末年一位值得大家钦敬的英雄人物，他在民族矛盾日益激烈、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挺身而出，抱着“扶颠持危”的社会理想和“欲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气概，起兵勤王，坚决反抗蒙元统治集团的侵扰，虽然兵败被俘，又抵拒威胁利诱，光荣就义，表现出忠贞不屈、守节不移的浩然正气和崇高精神。文天祥的诗词，是诗人用血泪写成的生活实录，镕铸进家国痛、民族恨，真实地描绘了宋、元易代之际的历史画卷，揭露出蒙元军队的暴行以及战火带给民众的灾难，凝聚着诗人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虑，倾注着诗人发自内心的悲恸激愤的真感情。这些作品，成为我国诗史上感人肺腑的优秀篇章，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理应受到重视。

然而，长期以来的文天祥研究，比较集中在他的人格力量和历史作用的探索和评论上，对他的诗词的研究，却受到不应有的忽

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常有一些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著名人物，因为他们的某种才能比较突出，声名卓著，其他才能的声名为其所掩。像唐代的颜真卿，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名臣，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他又是一位诗人和语言学家，却因他的书法艺术的声誉极大，人们也就不大知道他的文名。明代沈周是一位著名画家，也擅长写诗，他的诗名却被画名所掩，人们也就很少去研究他的诗歌创作。文天祥研究中出现的偏颇现象，也受到这种研究风气的影响。直到目前为止，文天祥诗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单篇论文和几种文山诗注本，尚无研究有素的专著出版。

从这样一个学术背景来看华民同志的《文天祥诗研究》，就很容易见出出版这部书的社会效益和学术价值，因为它对文天祥的诗歌创作，系统地作了历史的、美学的考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值得珍视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文天祥研究中一个方面的空白，为完整地、深入地、准确地认识和评论文天祥，作出有益的探索，使得这部书达到较高的学术层次。

我有幸成为最早阅读这部书稿的人，怀着欣喜的心情读完全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以用“力勤”、“审慎”、“思精”六个字概括我的读后感受。下面，我就此发表三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作者辛勤地从事着材料的搜集工作，辛勤地梳理、爬剔着基础材料，为深层的理论阐发提供坚实的基础。作者收集资料，其范围可谓广矣，其用力可谓勤矣。从时间上看，宋末、元、明、清以及近当代的各类文天祥研究的文字，都在作者的搜罗范围之内。从内容上看，各种文天祥传记、文山佚诗、历代史学、诗学家关于文天祥的评论、文山诗选注，作者都加以关注。作者还从文学研究本体论的观点出发，尤其重视在文山全集中搜讨论据，切

近文天祥的创作实际,使整个文山诗研究更为丰满,也更有理论深度。作者在论说文天祥的《集杜诗》时指出:“文天祥的《集杜诗》采自 381 首杜甫的五言诗”。并举出《胡笳曲十八拍》采自杜甫诗篇的实例如《悲陈陶》、《悲青坂》、《洗兵马》、《负薪行》、《岁晏行》、《虎牙行》、《暮归》、《白帝》、《晓发公安》、《同谷七歌》、《百忧集行》等,要为文天祥 18 首《胡笳曲十八拍》一一找出所集杜甫诗句的出处,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于此亦可见出作者耐心细致的实学精神。

其次,我以为作者在运用基础材料时,以极为严谨、审慎的态度,认真做好资料考辨工作。他在第十章“编诗考证”中,论述文天祥“手编其诗”,就《纪年录注》的错谬和《指南录》的疑点,对文山全集成书过程的复杂情况和古今记载的外误含混,详加考核,指其误,质其疑,得出正确的结论,澄清事实。《诗渊》第七册收录文天祥《汪水云援琴访予縲绁,弹而作十绝送之》诗,《文山先生全集》无载。作者除了赞同孔凡礼、张玉奇两先生的意见外,另外又举出三点理由,肯定这十首绝句是文天祥的作品,论之凿凿。又,作者对文凤翀根据明人赵弼《效顰集》补入文山全集的《出狱临刑诗歌》三诗,提出许多论据,进行质疑,明确指出《出狱临刑诗歌》为伪作。总之,作者对研究过程中搜集到的各种原始资料,一一加以审视、鉴别,正则用之,误则辨之,阙则补之,这方面的例证,在第十一章“作品考辨”、第十二章“人名考略”、第十三章“史传质疑”、第十四章“今论订误”中,还有许多,不再一一胪举。这充分说明本书作者自觉地树立起科学观念,十分重视文学研究、审美考察的准确性和精密度,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严密的考据的基石上,作风严谨、踏实,这是很值得称许的。

再次,本书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在于作者以敏锐的思辨能

力,系统论述文天祥诗歌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认识价值和审美功能,论述细密、精当,发前人所未发,新意迭见,很有理论深度。比如作者论文天祥的前期诗,力避简单化,缜密地将文天祥二百六十首前期诗区分为“文山山水诗”、“忧时诗”、“应酬题咏诗”三大类,联系文天祥的出处行藏、襟怀抱负,揭示出“文山山水诗”、“忧时诗”的深蕴意境和“应酬题咏诗”中所抒发的真情实感。这种从作品本身加以探索得出的结论,显然胜过那些空泛的议论。作者论述文天祥的后期诗,是颇用心力的。他不仅联系抗元斗争和被俘北行、大都囚禁的生活实际,阐发文天祥后期诗内容集中、主题突出、诗序结合、联篇吟咏的艺术特征,而且还条分缕析地论说《指南》两录写法的异同。“前后两期诗歌的转承”一节,作者更在论述文天祥前后两期诗歌风格变化的前提下,强调了前后期诗歌的内在联系,指出前后两期诗歌思想内容、艺术技巧、诗学渊源三方面,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以上这些论述,都发人深思,新人耳目。又如作者在论说文天祥《集杜诗》的时候,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文天祥不仅长于“集杜”,而且又“善于学杜”。第九章“文天祥与杜甫诗”一节还专门阐述文天祥“善于学杜”、自觉继承杜甫诗优秀传统的问题,作者分别在“体式”、“题材”、“语言”、“风格”、“诗史精神”、“爱国思想”六个方面加以探讨,论证文天祥继承杜甫诗优秀传统的方方面面,层层深入,论说精当。

在科学研究的“搜集资料”、“鉴别资料”和“运用资料”的三个环节上,本书作者能够做到“力勤”、“审慎”、“思精”,所以取得斐然的成绩,为学术界奉献上一份文天祥研究的新成果,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如果说本书还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我觉得,作者的考论有时还有点拘谨,书中某些章节,本可以纵笔放开来写,却戛

然而止,不再拓展下去。我相信,随着研究实践的不断深入,学术胆识的不断增长,作者的这种临文拘谨的状况,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继本书之后,华民同志还会有更多的研究课题要做,我翘首企盼着他更多的佳作问世,这也就是我在这篇短序里寄寓的一点殷切期望。

己卯岁十月序於苏州东小乔弄寓所

目 录

序	吴企明
第一章 引 论	(1)
第二章 前期诗	(11)
第一节 文山诗	(11)
第二节 忧时诗	(16)
第三节 应酬题咏诗	(19)
第四节 艺术特色	(22)
第三章 后期诗	(29)
第一节 《指南录》	(29)
第二节 《指南后录》	(41)
第三节 《指南》两录写法的异同	(48)
第四节 前后两期诗歌的转承	(55)
第四章 集句诗	(61)
第一节 《集杜诗》200 首	(62)
第二节 《胡笳曲(十八拍)》	(70)
第五章 文山词	(80)

第一节 背景与内容	(81)
第二节 风骨与境界	(87)
第三节 少作与连填	(90)
第六章 认识价值	(93)
第一节 宋季诗史	(94)
第二节 诗体自传	(97)
第三节 史料价值	(105)
第四节 一史二诗——《指南录》与《集杜诗》	(108)
第七章 艺术创新	(113)
第一节 发展纪行诗	(114)
第二节 开创狱中诗	(120)
第三节 提高集句诗	(123)
第四节 探索叙事诗	(128)
第五节 “赋笔未必逊比兴”	(131)
第八章 诗学思想	(138)
第一节 本体观	(139)
第二节 功能观	(143)
第三节 创作观	(146)
第四节 品评观	(149)
第九章 诗艺渊源	(153)
第一节 文天祥与汉魏六朝诗	(154)
第二节 文天祥与杜甫诗	(158)
第三节 文天祥与乡贤诗	(163)
第四节 文天祥与苏辛词	(171)
第五节 博采众长,转益多师	(173)

第十章 编诗考证	(179)
第一节 史传之讹	(180)
第二节 前录之疑	(182)
第三节 后录之辑	(185)
第四节 推测之见	(187)
第十一章 作品考辨	(190)
第一节 关于《酹江月·驿中言别友人》	(190)
第二节 关于“临刑歌诗”	(199)
第三节 关于《登武遂城》	(201)
第四节 关于“送汪元量七绝十首”	(203)
第十二章 人名考略	(208)
第十三章 史传质疑	(222)
第十四章 今论订误	(236)
后记	(255)
主要参考文献	(257)

仓卒勤王万里身，
风尘颠倒作累臣。
三纲已去嗟何补，
一死临期认自真。
直以安危系天下，
未宜成败论斯人。
遗文尚可诛奸贼，
何但悲辛泣鬼神。

——文徵明《咏文信国事四首·其二》

第一章 引 论

文天祥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民族英雄，又是南宋末年杰出的爱国诗人。

南宋理宗端平三年五月二日(公元1236年6月6日)，文天祥出生于吉州庐陵县淳化乡富田魁巷村(今江西吉安富田乡文家

村)。原名云孙,字天祥,后以字行,改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

文天祥一生,可以勤王抗元为界,分作前后两期。

少年文天祥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刻苦读书,18岁参加乡校考试,名列第一,20岁中选吉州贡士,21岁状元及第,因父亲病故而守丧三年后出仕。起兵抗元前,文天祥曾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军器监,权刑部郎官,尚书左司郎官,兼学士院权直等职,又曾出知瑞州、宣州(宁国府)、赣州,提刑江西、湖南。在政以贿行、官唯谄取的当时,文天祥仕途坎坷,“累为台臣论罢”^①,而能清忠自厉,正道直行,未尝稍许折腰。邓光荐《文信国公墓志铭》云:“公高明俊朗,英悟不凡。逾弱冠,即先多士。感激理宗亲擢,不倚近利,齷齪自弃。故其立朝有本末,谏诤有风烈。治郡持节,廉明有威。”这是对文天祥前期的准确概括。

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一月,元军渡江南侵,文天祥奉诏勤王,从此直接参加并领导了南宋末年的抗元斗争:始则驻守吴门,驰援常州,回救临安;继则受命于危难之际,朝为枢密使,午升右丞相,单骑赴元营谈判,为敌所拘,被押北上,而以非凡的勇气和胆略脱逃南归;益王赵昰即位后,文天祥拜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数年崎岖岭海,转战闽、粤、赣,出生入死,竭智尽力,欲挽狂澜于既倒。惜南宋大势已去,回天乏术,而于五坡岭兵败再执。元朝统治者企图用长期囚禁来消磨英雄意志,处之以困苦,挟之以刀锯,许之以高官,诱之以大用,又动之以骨肉之情,软硬兼施,却百般无奈。文天祥殉国死节之志坚定不移,经受了异乎寻常的严峻考验,以必死等一死,最后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283年1月9日)从容就义,年仅47岁。王炎午《望祭文丞相文》云:“扶颠持危,文山、诸葛,相国虽同,而公死节;倡义举勇,文山、张

巡,杀身不异,而公秉钩。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对文天祥给予极高的评价。“三千年间,人不两见”,赞誉或许过高,但确实可以说,文天祥是我国古代爱国志士仁人的杰出代表!

文天祥能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不是偶然的,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是重要的决定因素。

我国古代自屈原一改“朝秦暮楚”的春秋士风而高标忠君爱国以后,历代志士仁人层出不穷。随着历史的发展,反侵略、反投降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为我国各族人民所共有,成为华夏民族之魂。有宋一代,积贫积弱,辽、夏、金、元相继侵扰,外患连绵不断,这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最为激烈、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年代,同时又是爱国主义精神最为发扬光大的时期。从“杨家将”到“岳家军”,从寇准、李纲、宗泽、岳飞、韩世忠、虞允文到陆秀夫、张世杰,两宋三百年间,坚决抵抗外敌侵略的英雄群体和著名将相史不绝书。就思想领域而言,南宋的儒家,不论朱熹为代表的理学,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还是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派儒学,他们在抗金救国方面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理学家多是坚定的爱国论者。就文学领域而言,爱国诗一直是南宋诗的主流和基调,虽“词为艳科”,爱国词却在靖康之难后风靡数十年,一度独领风骚,爱国主义诗词的创作在南宋一次又一次地掀起高潮。即使北宋,也有很多优秀的爱国诗篇。宋代诗词在表现抗敌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感情方面在我国古代是最为突出的。

文天祥的家乡当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两宋时的庐陵有所谓“四忠一节”:文忠公欧阳修,忠襄公杨邦乂,忠简公胡铨,文忠公周必大,文节公杨万里。杨邦乂于建炎三年被金兵俘虏,宁死不屈,咬破手指写下“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的血书;胡铨反对求和,

力主抗战,上疏请斩权奸秦桧、孙近、王伦,忠愤悲慨,大义凛然。青年文天祥曾在庐陵学宫陈列的乡贤遗像前发誓:“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创办吉州“白鹭洲书院”、对文天祥极为赏识的前丞相江万里,在饶州陷落之时,自沉而死;文天祥幼年塾师曾凤,相从起兵,积劳成疾,病死军中;随文天祥勤王的江西义军将领,在兵败国亡,临危遇难之时,皆甘心就死,无一人肯降。高宗绍兴年间,以大无畏气概作诗二首,为编管新州的胡铨送行的爱国诗人王庭珪,曾“主庐陵文盟者六十年”^②。宋亡前后,继承辛弃疾爱国词豪放词风的词人(如刘辰翁等)大多以庐陵为活动中心。文天祥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清代江西巡抚裕泰《重刊文信国公全集序》云:“余丁酉冬,阅武临吉州,见夫山川崛奇盘郁之气,而叹天之钟美于是,宜有迈今铄古不世出之人,生乎其间也。”江西、吉州的自然环境当然不能说明问题,但家乡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无疑对文天祥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文天祥的父亲文仪,嗜书爱竹,藏书丰富,读书勤奋,虽一生未取功名,而学识渊博,其书斋题为“傍竹居”,其为人正直、忠厚、有操守。文仪号革斋,欧阳守道《挽革斋先生》诗云:“卖尽黄金只爱书,尽教冷口笑贫儒。于今有子如尧叟,到处逢人说老苏。可谓死而无憾矣!孰云文不在兹乎?渊明地下闻君葬,也向黄花洒泪珠。”由于经济拮据,不能长期聘请家庭塾师,所以对文天祥兄弟的教育主要是文仪自己担负的,而文天祥后来追忆说:“儿时爱读忠臣传”(《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由此可窥见文仪教育子女的内容。对于母亲,文天祥在悼诗中一再说:“母尝教我忠,我不违母志”(《邳州哭母小祥》),“当年嫠纬意谓何?亲曾托我夜枕戈”(《哭母大祥》)。父母亲的品格及其教诲,也是文

天祥爱国精神形成的重要原因。

文天祥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民族英雄,他的爱国思想是同忠君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民族气节是同尊王攘夷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铭”,囚系燕狱时的这一表白,充分说明文天祥的忠君意识是多么强烈。他的代表作《正气歌》,也论述了爱国之正气与忠君之纲常的密切关系。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文天祥早年在《御试策》中就把农民起义视同“盗贼”,并向最高统治者提出所谓“弭寇”的对策;前期任湖南提刑时,他参与镇压了湘、桂交界处以秦孟四为首的农民起义,后期出兵江西抗元,他还“斩汀州伪天子黄从”(《纪年录》丁丑年),又一次镇压了农民起义,使亲痛仇快,严重影响了本民族的团结和对敌人的斗争。文天祥所依靠的主要是官僚士绅,他没有能够广泛发动和组织人民的力量共同抗元。文天祥的爱国思想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评价特定的历史人物。

宋元战争,是蒙古贵族侵略汉族地区、宋朝军民被迫进行抵抗的军事斗争,正义一方自是南宋而非元蒙。蒙古贵族在逐渐强盛、征服欧亚的过程中,包括在侵略南宋的过程中,大肆烧杀抢掠,铁骑所至,使农业生产、封建经济、社会文化都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黎民百姓惨遭杀戮,生灵涂炭。文天祥的《常州》诗就愤怒控诉了侵略者的“屠城”暴行。为了维护正义,为了捍卫本民族的正当利益,文天祥挺身而出,英勇抗击蒙古贵族的野蛮侵略,以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民族气节无疑应该充分肯定。

蒙古贵族的南侵,不仅损害了汉族统治阶级的利益,汉族劳动人民也处在了更为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当此之际,汉民族的不同

阶级在反对外族侵略和压迫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愿望和要求,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封建王朝成为整个民族的象征,封建君主成了整个民族的代表,忠君意识,就不仅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也在客观上具备了维护全民族利益的职能。忠君与爱国的高度一致,是我国古代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文天祥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指南后录》有这样一首诗,标题很长:

张元帅谓予:“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予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张为改容,因成一诗

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

智灭犹吞炭,商亡正采薇。

岂因微后福,其肯蹈危机?

万古春秋义,悠悠双泪挥。

文天祥的忠君爱国,是盛衰不改,存亡不易,并且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全无私心杂念。这一点,连敌酋也不能不为之“改容”。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文天祥还能把爱国与忠君区别开来,始终以社稷、民族为重。文天祥早年乞斩董宋臣时就要求理宗“以宗庙社稷之故,割去私爱,勉从公议”(《己未上皇帝书》);在太皇太后谢道清遣使请降,朝廷降元既成事实之后,仍不肯屈身投敌,不改抗元初衷;囚系大都,亡国之君赵显前去说降,也遭坚拒。文天祥以身相许的是赵宋社稷,并不只是忠于皇帝个人。在回答元朝丞相博罗的诘难时,文天祥理直气壮地说:“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